

在现状未改观之前,谈论“三公”经费的合理性是奢侈的、没有意义的,其合理性,必须通过财政民主加以实现。

不能绕过民意 谈“三公”经费合理性

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最近撰文指出,“三公”经费并非越少越好,更加合理化,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。关于配车的范围,他说不能以级别为标准,比如县长是处级干部,原则上不能配车,但是也不能让县长骑着自行车到处去开会、检查和应急。

“三公”经费并非越少越好,这个逻辑判断大体上是说得过去的。的确,如果“三公”经费少到影响政府正常运作的程度,肯定不是一件好事——政府破产了,谁为公众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?至于说到“三公”经费的“合理性”,就有深入探究的必要。

虽说“科技与管理是车之两轮,鸟之两翼”,科技与管理还是存在质的不同。科技存在着超然于主观之上的内在规律,管理则具有更多的社会性和鲜明的政治性。一项公共政策的“合理”与否,根本不存在客观的、统一的标准,不同群体的感受千差万别,甚至迥然不同。用民间视角审查,“三公”经费当然是越少越好,若能用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,何乐而不为?如同“三公”消费主体的感受,当然是——茅台比二锅头好喝,IPad比U盘好用,奥迪比帕萨特舒适……“三公”经费自然越高越“合理”。君不见,每当离奇的“三公”消费事件被曝光,当事人总能找到“合理”的借口。

就“到处去开会、检查和应急”作为县长配车“合理性”的逻辑,也未必站得住脚。县长能不能骑自行车去开会、检查和应急,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,不可一概而论。如果就近开会、检查和应急,县长为什么不可以骑自行车?不能骑自行车,也可以选择坐公交、打的士、开私家车等,而不是非得公款配车、司机不可。

在一些公共财政管理比较成熟的国家,别说区区的县长,即使部长也不是全能享受公车待遇,如英国只有首相和外交大臣、财政大臣等内阁中少数几位人物出行才配有公车。缺乏足够的公车,也丝毫不影响他们的行政效率,照样高效运转。由此可见,所谓的“不能让县长骑着自行车到处去开会、检查和应急”其实是一个伪命题,为与不为在乎管理者的决心,能不能为视乎制度安排。

“三公”经费支出畸高长期困扰社会,总得不到有效纠正,很大程度上是权利失衡的结果。政府为了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而征税,纳税人为了获得市场无法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而纳税,纳税人和政府就像是委托人和受托人,是两个平等的主体。

然而,长期的实践却导致这样的结果:纳税人权利旁落,缺乏相应的话语权,而一些财政资金的使用者却不受约束,随心所欲。在现状未得到改观之前,谈论“三公”经费的合理性是奢侈的、没有意义的。“三公”经费的合理性,必须通过财政民主加以实现,这一思路主要体现在两个节点,一是事前控制,二是事中监督。加大对政府预算编制的审议,使预算更科学、更精细、更贴近民意,是为事前控制;将公共财政的运行置于阳光之下,接受公众挑剔的目光,是为事中监督。 洪洋

数字常给人带来最直接的冲击力。一次偶然的的机会,碰到这样一道数学题:90%×90%×90%×90%=?。结果是59%。

“90%乘积”背后的责任链意识

在人们印象中,不论是工作,还是学习,若能达到90%,即便够不上优秀,也算差强人意。然而,5个90%的乘积竟然是59%,连“及格线”都达不到,更别提更多的90%相乘了。

数学题不是数字游戏,背后蕴含着深刻的道理——决定结果的,不是所有过程的平均数或简单叠加,而需所有相关过程都竭尽全力地向100%的目标冲刺。这与“取法乎上,仅得其中;取法乎中,仅得其下”的古训颇有契合之处。

安全生产领域的“海恩法则”告诉我们,每起严重事故背后,必然有29次轻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隐患,这投射出一些人责任心的缺失。也曾有人计算过,假设火箭有5万个零部件,若要使整体安全系数达到99.99%,那每个零部件的安全系数则要达到99.9999999%!正是因为中国航天人对质量“锱铢必较”、对细节一丝不苟,才有了神舟八号与天宫一号在太空的完美对接。

世间万象,事理相通。一个单位,一个团队,一个工作流程,每个成员、每个环节就是一个乘数,其责任心就是成功系数,所有人的责任心构成一条责任链。工作的成效,取决于这条责任链的强弱,即每个组成元素责任心乘积的大小。要想十拿九稳、万无一失,责任链上的每个参与者都需要尽可能地履行100%的责任。正如一位领导同志在电力机车公司视察时所强调的,“每个环节、每道技术都不应该出问题,也不允许出问题”。

然而,有一些人看不到自己在责任链中的重要性,认为自己不过是一个节点,还有其他环节、关口,习惯把问题留给下一站;或是满足于甚至低于“90%”的水准,做事多少打点折扣,未能尽职尽责,把工作做得尽善尽美。诸如问题食品在“踢皮球”中摆上了百姓餐桌,劣质保障房在监管空白下拔地而起,污染项目在环保指标一再缩水后强势上马……这些不该犯下的错误、不该发生的故事,无不根源于责任链的松动、责任意识之缺陷。

“5个90%”的乘积给人的警示是深刻的。在今天的经济社会生活中,我们每个人都很难孤立地存在,都是在为某一项共同工作而分工协作。全国各地、各个部门、各行各业,每一个人,都是其中的一个乘数,如果每个参与者都“留一手”、“放一放”,不尽最大的努力去执行和落实,那么整体目标就可能落空,个体的诉求也将无所依傍。

在一个分工日益精细、利益日趋多元的社会,我们需要强化“责任链意识”,每个人既对本岗位工作负责,更对整体工作负责;既对自己负责,也对集体负责。多些“最后一道闸门”的警醒,少些“击鼓传花”的放任,多些精益求精的执著,少些“差不多就行”的散漫,尽职尽责、精诚协作,我们就能增强责任链的强度,形成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,最终取得一个圆满的“发展乘积”。 建和

压缩贪官的 潜伏空间

从1991年到2009年,走过19年贪腐之路,江西南昌市委原常委、南昌县委原书记汤成奇,近日被一审判处死缓。贪污3901万余元、受贿350余次,这一腐败个案再次让人思索:从开始贪腐到受到查处,少数贪官的“潜伏期”为何那么长?

型仍在探索之中,政府仍有“万能政府”的色彩,这使权力的影响在一些该退出的领域内不降反升,使领导干部插手一些该放下的事务不减反增。这给一些心怀鬼胎者提供了肥沃的腐败土壤,也是贪官的作案手法愈发隐蔽、“反调查”能力越来越强的原因。

有着漫长潜伏期的贪官,并不只汤成奇一个。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,自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上任开始卖官,潜伏10余年;广东省韶关市公安局原局长叶树养落马时,贪腐时间已长达20年。《法制晚报》曾分析,1991年至2004年审判后经媒体公开的200个典型腐败官员案例中,60%的贪官潜伏期都在5年以上。与“贪腐一两年,铁窗一辈子”相比,这些长期逃脱惩罚的贪

官,为害尤烈,会让人心存侥幸,刺激更多贪腐行为出现。而贪官的潜伏期越长,破坏就越大,我们的执政资源也就流失得越多。

尽管只是少数个案,贪官“潜伏”也反映出制约权力、完善机制、公开透明的紧迫与必要。它提醒我们:面对“腐败能人”,对干部的任用、考察制度,已有的制度监督、群众监督、舆论监督,是否还能更有针对性、反应更灵敏?述职述廉、任职前考察公示、民意测评这些干部任用、考核的制度,如何能够避免失察、及时发现?如何通过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换、缩短改革阵痛期、压缩甚至杜绝“潜伏空间”呢?

汤成奇今天的下场正应了陈毅诗云“手莫伸,伸手必被捉”,显示了我们党在查处贪官方面绝不手软的决心。不过,面对保持党的纯洁性的要求,面对群众对反腐败的期待,如果“伸手没被捉”,则能减轻汤成奇们的腐败影响,也才能彻底清除党的肌体上腐败的坏疽。

张铁

自称执法“就靠抢”

据2012年2月7日央视网报道,光天化日之下,摆在门口的元宵竟然不见了,一打听才知道,原来被城管执法人员“征用”拿到敬老院慰问去了。这是2月2日哈尔滨市双城市一些商贩遇到的事情。而双城市城管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给出的说法是,他们就是一个抢的单位,领导让他们抢他们就抢。2月6日,该局局长在接受微博联播记者采访时承认执法人员执法“走样”。 王铎 绘



清理野蛮标语 是对现代文明的补救

记者从海南省人口计生委获悉,从2012年起,海南人口计生系统将用一年时间优化计生户外宣传标语,使标语内容更趋人性化,“少生孩子多养猪”等类似生硬计生宣传语将逐渐走向消亡。(2月7日《北京晨报》)

“少生孩子多养猪”、“少生孩子多种树”等标语,相信许多人都见过。现在想来,养猪、种树和少生孩子之间确实没有必然的联系,不知道当时标语的制定者是怎么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。还有些标语,相信会让许多人不寒而栗。

现在而言,这些标语已背离了现代文明。社会学家洛克在《政府论》中说,“国家所以被需要,就在于需要它来保护个人的财产及其

他”。因此,现代政治文明讲究要对纳税人表示出足够的尊重,在服务的基础上进行管理,即便到了执法层面,也应文明执法。清理野蛮标语,顺应了现代社会的发展潮流,还原了权力对权利、政府对民众、公仆对纳税人的起码尊重。

语言上的野蛮和暴力,只会对暴力行动产生引导。标语只是表面现象。更主要的是,在野蛮标语的背后,我们看到了权力对于权利的

不尊重。而这也正是干群关系持续恶化的原因之一。

在其他领域,尤其是城管执法领域,野蛮标语与野蛮执法方式也层出不穷。至于社会窗口单位之中出现不文明现象,就更不必多言了。归为一言,在我们的现实环境中,权力有时没有摒弃掉其傲慢态度,甚至不把纳税人当成应该尊重的个体与对象。

让百姓有尊严,就是所谓的文明。温家宝总理曾不止一次说过,要让人民更有尊严,更加幸福。那么,这就需要无论是宣传标语,还是服务、管理和执法,都需要让老百姓感受到尊严。只有这样,文明才会渐进,社会才会进步。 传涛

大火为何烧不掉 问题官员的官途

问题官员频繁复出,有人把原因归结于制度漏洞,缺少官员退出机制,有人归结于畸形政绩观和上下级利益共同体在作怪。当然,还有人认为,应给问题官员“重新做官”的机会。尽管问题官员该不该复出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,但即使要复出,也要视情况而定。比如,影响比较恶劣的,责任比较重大的,相关官员不应该再复出,官途应从此画上句号。否则,不仅对职务受害人、社会公众无法交代,也会形成一种不好的复出风气和习惯。

以静安大火为例,一起造成58

人死亡的重大火灾事故,如果问题官员轻松复出,不仅公众在情感上很难接受,也很难达到什么惩戒效应。静安大火之所以烧不掉问题官员的官途,不仅在于现有问责制度尚存漏洞,还在于公众话语权缺失。如果问题官员能否复出让公众发声,结果或许就不一样。

无数的问题官员复出案例提示我们,该对问题官员复出机制严格管理了,也该给公众一些表达意见的机会了。也只有当强力问责下,各种事故也许才能少一点,民众幸福指数才能高一点吧。 海英

教育部2月1日公布了义务教育阶段19个学科新课程标准的具体内容。从今年秋季新学期开始,中小學生将启用根据新标准修订的新教材。其中,新版的语文课程标准减少了小学低年级识字量的要求,但新、老课标对义务教育阶段的识字总量要求相同——中小學生在9年内应认识3500个左右常用汉字。同时增加了中、小学各阶段要求背诵的古诗文篇目以及推荐课外阅读的内容数量。

对新课标语文的一点建议

中国的语文教学是一个系统工程。语文教学的好坏,重点在教(学)什么和怎么教(学)。课程标准要解决的是教(学)什么问题,怎么教(学)是另外的问题。

对一个学习中国语文的人来说,小学6年加初中3年能够认识3500个左右常用汉字,已经完全不存在读书作文的障碍。中国古代文学家司马迁撰写《史记》,一共用了4932个单字。根据计算机的统计结果,《史记》全书内容50%的单字只有108个。《史记》使用频次超过1000的前115字,覆盖了全书51.273%的内容;依频次排列在前的1308个字的累积覆盖率是95%。

新课标要求三四年级学生须累计认识常用汉字2500个左右,其中会写1600个左右,而老课标要求会写2000个左右,新课标减少了20%。无论按照新老课标,小学四年级的学生都可以读通《史记》95%以上的内容。我们要知道,《史记》中有1017个字司马迁在书中也只用过1次。换句话说,这1017个字在司马迁那个时代都是罕用字。因此,9年时间认识3500个左右常用汉字,确实可说是写一部今天的《史记》都够用了。

以此观之,我以为语文教学从认识常用字出发,最终的落脚点在写作。识字的目的是为了读与写。仅仅能够读,只完成了识字的一半目的,更重要的一半在于写作。语文教学始终不能把作文教好,很多中学生毕业后还写不出一篇像样的文章,这是语文教学的失败。误人子弟啊!

新课标增加或调整了古文背诵推荐篇目,我以为非常好。至于所选篇目,则见仁见智。中小學生打下一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,终身受益。背诵古文经典之作,除了增加或调整的篇目外,我建议可以考虑增加中国古人古文的经典文(语)句。我看到有台湾教师、学者通力合作,编辑了“中文经典100句”系列图书,从《论语》、《史记》、《古文观止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诗经》、《庄子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唐诗》、《宋词》、《红楼梦》这10本书中把精彩内容提炼出来,供青少年诵读。我想,我们的中小學生语文课程标准里,不但要让中小學生认识3500个常用汉字,还需要至少记住古典文学中的1000名句。中小學生一时理解不了名句中的全部含义也不要紧,随着年龄的增加会慢慢加深认识。比如,“子曰:‘学而时习之,不亦说乎?有朋自远方来,不亦乐乎?人不知而不愠,不亦君子乎?’”“孟子曰:‘人有恒言,皆曰‘天下国家’。天下之本在国,国之本在家,家之本在身。’”孔孟的这些名言名句,三四年级的学生未必都能理解,先背诵下来,长大了再理解也无妨。写作的人常感“书到用时方恨少”、“言之无文”,那是因为我们的语文教学出了问题。语文教学的问题,首先是教材问题。教材的问题,是课程标准的问题。 文洋

统筹城乡、区域发展,逐步使大多数流动人口在城市和农村各得其所。7日召开的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工作座谈会上,中央领导同志提出的这一要求,为破解流动人口管理难题指明了方向。

让流动人口 在城乡各得其所

随着改革开放和工业化、城镇化的加速推进,我国人口流动规模不断扩大。2亿多流动人口特别是1.5亿多农民工,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,也给社会管理带来严峻挑战。近期,一些地方发生本地人与外来务工人员摩擦事件,进一步说明对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已经成为社会管理中非常突出、且难以解决的问题之一。

城市是流动人口的主要聚集地,流动人口往往处于城市生活的边缘地带,归属感、幸福感缺失往往带来责任感相对下降。对城市管理者而言,迫切需要转变管理轻服务的理念,坚持以人为本、服务为先,切实解决好流动人口子女上学、社会保障、医疗卫生、住房租房等实际问题,让他们真正融入城市、安居乐业;要公平对待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,协调好不同居民群体之间的利益,及时化解不同诉求、不同文化的矛盾,促进流动人口与当地居民和谐相处。

大量外来务工人员涌入城市,既与城镇化、工业化进程有关,也与城乡间的现实落差有关。破解流动人口管理的难题,既需要采取措施帮助流动人口融入城市,也需要采取措施增强农村的吸引力。为此,要坚定不移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,努力缩小城乡、地区之间的差距,让广大农民逐步同城市居民一样享受最基本的公共服务;要调整产业、区域经济结构,大力发展县域经济,尽可能就地就近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,逐步使大多数流动人口稳定下来。

当前,破解流动人口管理难题仍需继续摆到突出位置,认真探索研究扎实推进。要进一步加大科学规划力度,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我国究竟会有多少人口在城市、多少人口在农村做到总体清楚;要优化布局,使人口分布与国土规模、资源环境、城镇体系、发展潜力等统一协调;要创新思路,稳步推进户籍、社保制度等各方面改革,破解城乡二元“藩篱”。

没有流动人口的安居乐业,就没有全社会的和谐稳定。希望各级党委政府认清形势,履行好职责,认真梳理解决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方面的薄弱环节,维护亿万家庭的幸福安宁,促进社会大局的和谐稳定。 英峰